第三期

中德學志

Chinesisch-deutsches Jahrbuch
für kultur-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

2011版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主编 陈洪捷

执行主编 叶隽

德国研究的视野与范式

德国研究——从加拿大角度出发的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观点 [德]库尔特·许布纳
在“现代中国”与“现代德国”之间
——作为21世纪显学的“现代民族国家”与跨专业学科群“德国学”的建立 叶隽

专题研究

论法苯工业的“新秩序”规划——从“大空间经济”观看法苯与纳粹政权的关系 李维
从经济纲领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演变 刘玉霞 蒋锐

评论与对话

重组认同结构——谈东德德发制片厂(DEFA)1946至1961年间拍摄的的电影 [美]凯蒂·唐普娜
后戏剧剧场（节译） [德]汉斯·蒂斯·雷曼

图书评论

观念的力量——评《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沈文钦
中德学术关系之建构——读《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 叶隽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德學志

2011版

Chinesisch-deutsches Jahrbuch
für kultur-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主编 陈洪捷 执行主编 叶隽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ZDS

Chinesisch-deutsches
Jahrbuch
für kultur-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

ISBN 978-7-301-19514-7

9 787301 195147 >

定价：45.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德学志(第3期)/陈洪捷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

ISBN 978-7-301-19514-7

I.①中… II.①陈… III.①中德关系-文化-交流-文集 IV.①G1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9570号

书　　名:中德学志·第3期
著作责任者:陈洪捷　主编
责任编辑:张善鹏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9514-7/Z·010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0883
出版部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20印张　350千字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编委会

主　编：陈洪捷

副主编：甘超英　韩水法　黄燎宇　叶　隽　王　建

编委会：曹卫东　陈洪捷　甘超英　韩水法　黄燎宇
景德祥　连玉如　刘立群　庞学铨　王炳均
王　建　王世洲　卫茂平　叶　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德国研究的视野与范式 …… *1*

导言：德国学命题之呈现与学域三重归属之意义 …… 叶 隽 *3*

德国研究

——从加拿大角度出发的批判性和建设性观点…… [德]库尔特·许布纳 *12*

在“现代中国”与“现代德国”之间

——作为21世纪显学的“现代民族国家”与跨专业学科群

“德国学”的建立 …… 叶 隽 *17*

拓宽德国当代哲学研究的视野 …… 庞学铨 *37*

德国：清末中国现代化的榜样

——1871—1911年中德关系的另一视角 …… 顾俊礼 *49*

专题研究…… *57*

论法苯工业的“新秩序”规划

——从“大空间经济”观看法苯与纳粹政权的关系 …… 李 维 *59*

从经济纲领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演变 …… 刘玉霞 蒋 锐 *78*

“法治国家”思想在德国的产生、变化和发展概述 …… 梁志建 *86*

法律语言中的模糊性与精确性 …… 李 婧 *99*

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及其近代中译 …… 伍红玉 *128*

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英格博格·巴赫曼晚期诗歌中维特根斯坦的影响 …… 马 剑 *139*

性别、媒体与文学产业

——对当代德语文学“文学少女奇迹”现象的再思考 …… 何 宁 *146*

跨文化交往和跨文化态度 …… 姚 燕 *156*

赵林克悌与建国初期北京大学德语专业的发展 …… 王世岳 *172*

评论与对话…… *187*

重组认同结构

——谈东德德发制片厂（DEFA）1946 至 1961 年间拍摄的电影

…… [美] 凯蒂·唐普娜 *189*

后戏剧剧场（节译）…… [德] 汉斯·蒂斯·雷曼 著 / 李亦男 译 *205*

雷曼的《后戏剧剧场》…… 李亦男 *211*

文化是我们的力量

——由德国文化政策所看到的 …… 周睿睿 *215*

格拉斯：往事并不如烟 …… 刘红霞 白馨馨 *231*

图书评论…… *245*

观念的力量

——评《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 沈文钦 *247*

中德学术关系之建构

——读《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 …… 叶 隽 *260*

国家崇拜与民族灾难 …… 孙立新 于晓华 *265*

《德国循环经济研究》读后…… 张象枢 *272*

永在希特勒的阴影下

——“历史学家之争”文献汇编 …… 张 芳 *279*

德国历史编纂中的第三帝国与大屠杀

——走向 80 年代中期的“历史学家之争”…… 周 玲 *284*

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

——德国的普通民众和大屠杀 …… 林雅华 *292*

帝国的毁灭 …… *302*

编后记…… *311*

德国研究的视野与范式

- 导言：德国学命题之呈现与学域三重归属之意义
- 德国研究
  ——从加拿大角度出发的批判性和建设性观点
- 在“现代中国”与“现代德国”之间
  ——作为21世纪显学的“现代民族国家”与跨专业学科群“德国学”的建立
- 拓宽德国当代哲学研究的视野
- 德国：清末中国现代化的榜样
  ——1871—1911年中德关系的另一视角

导　言

德国学命题之呈现与学域三重归属之意义

叶　隽

我们在这里提出“德国学”的命题，并非要“占山为王”，或是“自娱自乐”，而是有着强烈的学术共同体意识的学术建设工程，即在中国现代学术整体建构的框架中来确立自己的定位；是在外国学大框架下，更是在“西方学”、“欧洲学”的通盘思考之中来明确自己的定位。在我看来，一方面我们要建构自己的“西方学”学术理念，另一方面也仍要细分概念，即在子集分类的深入层面逐步探讨西方学的若干子概念，譬如欧洲学、北美学、澳洲学等；进而建构如日耳曼学、罗曼学、斯拉夫学等，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环环相扣的“金字塔形”学术建构；在日耳曼学之下，我们可以分出诸如德国学、荷兰学、瑞典学等，最后的目的是从分散到整体，认知作为欧洲北方文化的日耳曼文化[1]。

当然，我们不仅要有另立维度的“国学－外国学”的二元思路[2]，也还要思考是否存在客观意义上的“西方学－东方学”的二元维度？当然，其前提和最基本的工作仍是具体国别学科的建设，譬如具有基点文明意义的德国学、法国学、俄国学等。如果我们讨论东方学的话，那么绝对不能将中国排除在外，否则不是一种客观、

[1] 就以与“西方学”相呼应的“东方学”概念来说，应该是亚洲学、非洲学、拉美学；而亚洲学又可继续区分汉学、梵学、闪学等；在汉学（广义概念）之下可继续区分蒙古学、华夏学、朝鲜学等。

[2] 杨武能教授批评我将中国的国学和所谓外国学相提并论。参见杨武能《序：不只是一部学科史……》，引自拙著：《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其实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为了彰显思路而提出的权宜分类，但却也未尝不可看做为了彰显中国主体性意识的一种方案。

理性、科学的立场。

所以，就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学术史脉络来看，我们最多可称为有了外国学建设的端倪，而尚未达到整合西方学的高度。近代中国（从一个长时段角度，我愿意称其为现代中国）发生极大之变局，其时知识精英的转型期代表人物其实已经意识到这样的“巨变”，这不仅表现在如李鸿章这样的政治领袖说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话[3]，更表现在知识精英对前贤的批评性反思，如黄远生曾非常精辟地分析了这一点：

> 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盖最初新说之萌芽，曾文正、李文忠、张文襄之徒，位尊望重，纲纪人伦，若谓：彼之所有，枪炮、工艺、制造而已；政法、伦理以及一切形而上学，世界各国，莫我比伦。嗣后国势日削，祸辱臻迫，彼此比较之效，彰明较著。虽以教钦顽嚣，亦不能不屈于新法。庚子之后，一复戊戌所变。其时新学髦俊，云集内外，势焰极张。乔木世臣，笃故缙庸，亦相率袭取口头皮毛，求见容悦。虽递嬗不同，要皆互为附庸，未有如今日笃旧者高揭复古之帜，进化者力张反抗之军，色彩鲜明，两不相下也。且其争点，又复愈晰愈精，愈恢愈广。盖在昔日，仅有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者，而在今日已成为思想上之争。此犹两军相攻，渐逼本垒，最后胜负，旦夕昭布。识者方忧恐悲危，以为国之大厉，实乃吾群进化之效。非有昔日之野战蛮争，今日何由得至本垒。盖吾人须知，新旧异同，其要点本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青之叶，非其本源所在。本源所在，在其思想。[4]

最后画龙点睛相当精彩，所谓“本源所在，在其思想”，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这当然涉及一系列相当复杂的问题，尤其是以一种“对战”的方式来理解“中西”（东西）之遭遇，未免过于强化一种二元对立思维，但从“武力之战”—“制度之战”—“思想之战”层层逼进，则确实又给我们展现出这种“二元冲突”的某种必然性一面。就一种整体性的潮流而言，我倾向于将“西力东渐”与“西学东渐”视为一种“阴阳流力”，就由一极到另一极的“流力因素”，其中难免有“战”的一面，但也有“融”

---

[3] 《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载李鸿章：《李鸿章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册第1063页。

[4] 《新旧思想的冲突》（？年），载黄远生：《远生遗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54—155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一面，如果西力东渐更多是引发出一种抗争性的“战”；那么西学东渐则无疑更多体现出一种交流性的“融”。具体到“西学”之具体划分，当然可以区分出多种不同类型的层次。但我此处主要凸显为“西诗东渐”、“西史东渐”、“西哲东渐”三个主干支柱[5]，当然其他学科范围，诸如社会科学各学科、自然科学等也会在适当时候予以讨论[6]。

清华之建立西洋文学系，似已初步意识到了“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1931年，系主任王文显在《清华大学各系概况》中介绍外文系情况，开宗明义就说本系与欧美大学外语系的目标有异，与各西方国家将各国文学分而治之不同在于：“本系的方针是不分国家民族，将整个西方文学从古至今，看作是一个整体。学生除学习其他语言外，还必须专门学习一种西方语言。但是在文学方面，则要求学生学习文学史和全部西方国家的文学。”凸显“学习西方文学，为的是了解西方精神，而西方精神是一个整体，并不是按国家而分开的东西”[7]。这是与北大之并行建设

[5] 关于文、史、哲的西学东渐内容，一些著作均有涉猎。较系统的，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在文学方面，可参见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中外文学比较史1898—1949》，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版；龚翰熊：《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西方文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乐黛云、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比较文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在历史方面，可参见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在哲学方面，可参见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其中包括如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以及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6] 关于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内容，其实学界也予以了关注，如李喜所主编的“中国学科现代转型丛书”，主要从留学生角度探讨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心理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在一些学科史著作中也涉及到相关内容，如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在自然科学领域，则可参见樊洪业、王扬宗：《西学东渐：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杜石然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董光璧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刘大椿、吴向红：《新学苦旅——中国科学文化兴起的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7] 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6—107页。

各外国文学系不一样的思路，值得特别予以揭示。虽然季羡林抱怨其作为德文专业的学生学了四年德文却只能看书而不善听说[8]，但这应是操作细节的问题（教师不用德语授课）。毕竟，这样一种在整体中把握作为一个文化体西方的思路，有其特殊的意义，可以说这代学人已经初步意识到“治学求真”的立定之处。而就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现代学术主体意义的“西方学”来说，更具有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所谓“中国‘西方学’及与其相关的‘欧洲以外的人们’之世界活动与世界观念的再发现，也将有益于近代意义上的西方之非西方认识”[9]，诚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东方学建构也甚为必要。相比较西方文学的强势地位，东方文学作为学科在现代中国的发展相对滞后。有论者认为在20世纪以后，即“进入现代意义的学科建构阶段之后，中国东方文学的知识生产就进入了一种自觉的历史发展阶段”[10]。考其实际，似不尽然，虽然北大早有日文乃至东方文学系之设，但旋即在1931年被合并为外国语文学系[11]；直到1946年才新建东语系，由留德归来的季羡林担任主任。作为一种学科群的东方文学自然有其价值和独特贡献，但或许拓展到东方学意识则尤有必要[12]，其实论及东方学所依据的“大师谱系”，则章太炎、梁启超一代到陈寅恪、许地山、汤用彤一代，再到季羡林、金克木、饶宗颐等一代，则治学之精深有别，而范围之拓展则无异。

故此，相比较西学东渐的泛泛概念，则“东学华见”的概念更值得提出。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文化受体的中国，它作为东方文化组成中的一个核心部分，本身具有“融化器”的功能，它对东方各子文化的接触、吸纳和化生，是特别值得探讨的。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不仅面临着自身面对强势西方的问题，而且也有一个如何

---

[8] 蔡德贵：《季羡林传》，第108页。

[9] 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第168页。

[10] 作者进而认为：“同时，知识生产和组织结构、规训制度、方法的建构也同步发展，尽管其间仍有不平衡，但对学科核心——知识生产的推进，作用巨大。”卢铁澎《中国东方文学学科建构的历史性》，载王邦维主编：《东方文学研究集刊》第3辑《东方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11] “国立北京大学志”编纂处编印：《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北京，1933年，第16页。

[12] 相比较泛泛强调强势学科的论声，我更欣赏从学术史研究入手凸显的学科整合意识，参见王邦维《与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有关的胡适的几件英文信》，载王邦维主编：《东方文学研究集刊》第3辑《东方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25—134页。

处理自己作为东方（首先是作为亚洲北方文化之代表），如何面对东方文化内部各种异质子文化之流入和碰撞的过程[13]，我们可能首先要处理的，是亚洲文化内部的交融问题，梵汉文化的南北互动结构历史悠久，已为前贤所高度重视；但对于闪文化（类似于伊斯兰文化），包括后起的日本文化，究竟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是必须清理和研究的。这是我为什么强调“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因，中国文化必须首先理清作为本体的“东学”（广义概念），然后才能更加充分、有自信力、有代表性地去面对作为现代人类强势文明的西方。这样的中国，就不仅是一个作为版图、人口大国的中国，而是作为东方代表的中国，其所当体现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灿烂文明，更应是东方文化的整体博大。

对于中国现代学术而言，除了研究范式的重大变迁之外，另一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必然是研究对象的无限扩张，如果说以前的“经史子集”、“义理·考据·辞章”诸端无论如何复杂，都是“国学范畴”的话，那么，这里不可回避的话题就凸显为“外国学”。请注意，“外国学”是个非常奇特的概念，它不是一个有着统一尺度的客观研究对象范围，而是以民族—国家为高度坐标轴的学术概念。即每个具体国家的外国学概念所指涉的研究对象都是不尽相同的。但查诸事实，外国学这样的概念从来就没有在学术体制内获得建制上的充分认可。就体制建设角度来说，欧、美不太一样，欧洲（包括英、德、法等大国）基本都还停留在传统的汉学研究阶段，即以汉学专业（中国文学系）为限，而美国等则在此之外，还建立起所谓东亚研究或中国研究专业。中国虽远未赶上那一拨美国浪潮，对于正在逐步走上建设轨道，而因了经济崛起的同步，而必然要求学术崛起的中国来说，外国学问题已经到了不容忽视、必得讨论的时候了。我并不主张将具体的外国学纳入到现存的大学建制中去，倒不是说认为其不存在可能，而是更考虑到它实际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设计问题。对于学院内缤纷五彩的世界图景，有学者做过非常精彩的描述：宇文所安曾论及大学体制中的“世界文化”概念，在他看来，“大学里面不同的文学系和地域研究专业也构成了一个能够代表全球的版图，不但在系别的层次上是如此，在个体教师的职位层次上也是如此。”[14] 虽然宇文所安如此立说，别有关怀。但对

[13] 譬如有些重要的子文化，似乎还有待展开，如非洲文化、拉美文化，对它们内部子文化的考察恐怕还不具备较为全面的材料和学术积累。

[14] 《把过去国有化：全球主义、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命运》，载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40—342 页。

我们来说，这实际上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学术场域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世界文化的各体系。

那么下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定位外国学的问题。具体言之，当然首先是德国学在外国学中的位置。

在我看来，外国学的设计应立足于外国文学学科概念的确立。这个意思，其实从蔡元培开始，就已有所考虑了。在其出掌北大之前，北大之学科设置非常薄弱，涉外学科主要就是英国文学门。故此，蔡校长的一大手笔就是将各外国文学并置设系，即德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法国文学系等[15]；再在研究所中设立四个研究方向，即国学、外国文学、史学、自然科学，自然有其独到的学术眼光与选择，甚至他在1922年2月时提出："以研究所四学门为基础，每一学门出一种杂志"[16]，不过拟议中的文学刊物似乎并未成形。但蔡校长对于涉外学科，尤其是外国文学的关注则可见一斑矣。实际上，文学之功用，怎么高估也不过分。因其关涉国民精神，所以文学的功用决不可以其貌似可有可无而轻忽视之，如若过于急功近利，其后果自然会由历史予以解答。宇文所安论大学中的外国学，虽然未免过于站在后殖民的立场上，但揭示出的一个事实倒是无误，即"被选来代表国家烹调的食品既不能太家常，也不能太富有异国情调：它们必须处于一个令人感到舒适的'差异'边缘地带之中。"所谓"具有可译性的烹调风格"[17]，其实也是在说我们对他国"文化资源"的择取，必须考虑到"本土语境"的接受可能。

外国学问题，如果不仅能真正占据文化精英的思想视野，也能得到政治精英的高度重视的话，对一个国家长远之发展则意义极为重大。之所以强调"外国学"，而非过于泛泛的"世界文化"，就是为了突出自家的主体性意识与学术性立场，且强调的是具有总体中国人视角之下的"国别研究"意义，至于更宽广宏阔的"世界胸怀"，那不妨在对各国别都有精深研究之后的研究再来从容立论。既以具体的国别研究为原则，那么外国学的具体内容就不妨分为以下三大类：一是大国综合研究，即对于现代世界形成具有基点文明意义的重要国家，诸如美、英、德、法、日、俄、印等皆可列入其中；二是一般国家研究，这其中既包括具备自身立国之基础，并在

[15] 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56页。

[16] 《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发言》，载《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157页。

[17] 《把过去国有化：全球主义、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命运》，载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0—342页。

人类文明中获得一席之地的较为重要的国家，如瑞士、新加坡、韩国、南非、新西兰等；也包括一般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国家，诸如像越南、泰国、非洲的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美洲的智利等等；三是综合性专题研究，包括已逝去的文明，如希腊、罗马（意大利）、埃及、巴比伦等，可提出如“西方古典学”的概念；也包括一些重要的历史时期，如奥地利（奥匈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匈奴帝国、蒙古帝国、西班牙帝国等；甚至包括一些整合性的概念，如日耳曼学、罗曼学、闪学等；在此基础上加强整合性的研究，即区域研究，如非洲学、美洲学、欧洲学、亚洲学等。就目前国内研究状况看，美国学、日本学、韩国学、印度学等都已逐步成为一种趋势，但总体来看，由于各国发展状况、在华态势不同，各相关“外国学”发展也不一。但在有些方面，则主要是中国学者主体性的学术意识的问题。譬如“德国学”。

杨武能教授曾批评将日耳曼学或德国学的“Germanistik”这一学科称谓以偏概全地译成了“德国文学研究”[18]。应该说，这个问题确实“牵一发而动全身”，也是我在命笔之前再三犹豫的。我以为提德国学也好，提日耳曼学也好，应该并非简单地将外来概念进行翻译处理，而是具有中国现代学术主体性的主动建构。这种建构且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始终在两种维度中进行的，一则为西方学；一则为外国学。外国学的概念，并非是一种完全科学意义上的划分，但它确乎是在现实语境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强势客观存在，也就是凸显“他者”眼光和问题的一种方法。而西方学则既可作为一种客观概念，也可被当做外国学的子目，这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注意适当区分的。

实际上，我们在此探讨“德国学”的命题，固然是要弄清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的“德国”，进行一种具备中国现代学术意识的“学科建构”工作。但其实背后仍具备这样的意识，即“世界胸怀”与“整体建设”。因为仅仅是就德国谈德国，意义不大。具体言之，则有两种进路可供选择：一种是已有较多的基础，以德国学为例，德国文学、德国历史、德国哲学的研究都在已有的学术教育体制中存在多年，更需要的是一种整合的过程，这就需要在系统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提出有效性的学术命题，上升到学术理论的探讨层次。但对有些国别学而言，其基础虽有，但相对较差，不

[18] 杨武能：《不只是一部学科史——谈叶隽〈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11月14日。一个初步的回应，参见叶隽《“德国学”建立的若干原则问题》，载《中国图书商报》2009年4月14日。

足以进行上述工作，则可以考虑以新的范式研究介入，如奥国学。中国对奥地利的研究，无论是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远无法与德国研究相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进行策略性的选择，一方面要有逐步建构的思路，一方面在很少有学者以奥国历史、哲学或教育等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前提下，也可考虑暂时将其纳入德国学的范畴。总而言之，作为欧洲北方文化的重要代表，作为现代人类精神的"耶路撒冷"[19]，德国文化的地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故此，德国学在"外国学"谱系里的地位也赫然可见矣。

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凸显在非现行学术制度之内的"德国学"建构意义，但并非希望"一枝独秀"，而是想强调一种"多维视域"的互证意义。这里，我想指出学术归属的"双重性"甚至"三重性"问题，这一点对每个学者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譬如一个研究德语文学的人，他至少应介于"专业谱系"、"文化谱系"之间。在学术制度的学科框架内，属于所谓"外国文学"（一级学科），其实向上延伸之谱系应该为文艺学－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学术（包括社会科学）；但在现行学术制度之外的学科框架中，他应自觉确定"德国学"的定位，其向上延伸谱系则为日耳曼学－欧洲学－西方学－外国学等。我们始终需要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中理解我们工作的意义。在拓展一层，则有所谓"时间谱系"。即古典学－中世纪－现代学等概念。譬如一个研究20世纪德国文学的人，他应将自己归入到现代学框架之内，进而在这样一个谱系中考察自己研究的整体性定位。时段、专业、文化是一个治学者所必备的三个坐标，如此则其思路自然洞开，不会局限于一隅之狭隘。当然也有学者譬如说研究理论的人可以纵横驰骋于各种疆域，不必受以上任何标准之限制。诚然，此类做法，天才者固然可以如鱼得水、贯通而成；然而常人往往难免漫学无根、一无所得。譬如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三重维度，即：西方学、现代学、人文学。当然只有在"外国文学"也就是"文艺学"（人文学）这个范畴下，才是符合体制标准的，但这并不重要。西方学的意识，让我明白始终是在做一种立足本土、放眼异族的工作；而现代学的意识，则始终使自己能够不拘泥于书斋工作中的"神游故代"，而知道自己是生活在一个仍在历史进程之中的鲜活的"大时代"。

此处搜集的四篇论文，从不同层面指向关于"德国学"（德国研究）的范式和理论思考，无论是西方学者强调"从加拿大角度出发的批判性和建设性观点"，还

[19] 别林斯基致友人信（1877年），转引自［英］以赛亚·伯林著，彭淮栋译：《俄国思想家》，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98、199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